

小学里流行疹子,从教学楼的一个班传给另一个班。我还记得语文老师大声朗读:“火烧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,红彤彤的,好像天空着了火。”

在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地图上,地球看起来真像着了火。全球确诊病例已逾 3200 万,其中美国以 700 万例居第一,紧随其后的是巴西、印度、俄罗斯……

随着疫情发展,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,前些日子美国刚刚撤销了 1000 多个留学生的签证。特朗普除了说过要求中国对美国的疫情“负全责”,还语出惊人地说,中国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比美国多得多(当时美国约 19 万人)。

我此前因为疫情一直被困在美国,并且是在疫情最早被发现的西雅图,或许我可以从我读到的英文报道和自身经历,聊聊两国疫情的比较。

曲折的回国路

这一路上,我明显感觉越接近目的地,疫情防控的气氛就越严肃。在美国重灾区旧金山机场,这里的空乘人员依然只戴一个白色普通口罩为我们服务。此时,美国确诊人数已近 600 万。从旧金山到首尔搭乘的是韩国航空公司,空姐更严肃了一些,套了件一次性袍子,戴了口罩和护目镜。

从东京机场转机时,在回中国的值机柜台前,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“严阵以待”。无论是地面工作人员还是空乘,全都穿了全套防护服、护目镜和口罩。每个旅客重新登记旅行经历,多次测体温,上飞机前消毒双手……

我们就像参与了一部科幻片,逃向一片被层层保护起来的绿洲。

4月5日,哈佛大学病毒学家 Eric Feigl-Ding 在推特上转了一张黄山风景区人头济济的照片,评论中国或许会在十天内再次输掉这场战役。我可以理解他的担忧。对于这类

传染病来说,人口稠密的中国可以说是“先天不利”。

别说城中村、里弄、群租房,就是一般的小区都比西方公寓拥挤许多,再加上人流如织的上下班地铁,排队的餐厅、写字楼的电梯……除非大家都被严禁出门,否则社交距离不可能维持。每天国外入境那么多人,万一漏了一个无症状患者,恐怕会像燎原的星星之火。

现在,国内的生活全都恢复了正常,热门餐馆照样排队,商场内的儿童游乐场满员,《八佰》的票房超过 29 亿。大家约会、见面、旅行,一切如常。

我想普通市民的这种坦然是基于安全感。因为我自己走了一遍入境的程序,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安全感来自哪儿。

张文宏医生曾说,中国抗疫成功的关键点是“饱和式的检测”:只要发现一名病人,所有的病人全部都免费检测,以及“饱和式的追踪”:只要确诊了一个病例,不管你接触了多少人,我都把这些人给找出来。

饱和式检测

饱和式的检测我体会到了。我在回国不到一个月中,已分别做了五次喉拭子和两次鼻咽拭子检测。第一次是在刚下飞机时在机场做的,最后两次是我回国后的第 21 天和第 28 天。

现在看,这种跨度很大的频繁检测还是有必要的。前几天南京就发生一个案例:一个美国回来的无症状病例,此前每次检测都是阴性,直到最后一次(回国第 28 天)检出阳性。

特朗普一直把美国病例多归结为“测试多”,这并不对。譬如,美国截至 5 月 12 日时共做了 997 万次检测。而同期,光武汉一个城市在 5 月 14 日-6 月 1 日这几天的全民排查,就检测了 990 万人。

我记得在日本导演竹内亮的纪录片《武汉,好久不见》中,一个轻症患者做了至少 41 次检测,全是免费的。我没找到中国目前检测的总数字,恐怕是因为它已经“不计其数”。

同时,我有朋友在上海看急诊时,核酸检测结果是立等可取。虽然我经常新闻中看到美国公司研发了几分钟出结果的仪器,但似乎并未在普通医院推广。我三月因为低烧从家庭医生那里得到一次检测机会,但等了八天才出结果。

比尔·盖茨在 8 月份时曾说,“美国大多数新冠检测是彻底的垃圾”,是“美国疫情应



对中最差的环节”,因为在等待那么多天出结果时,病毒携带者可能早已感染其他人,或者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。

饱和式的追踪:自从到达上海机场后,我已经登记了不下十次回国的路线、航班号、座位号。我所住小区的街道在我入境第二天就打电话询问。手机上的健康码在入境 14 天后自动变绿……每个人被编织在信息网络中。当然,国外媒体评价这件事的角度可能是批评牺牲了公民隐私和自由。

除此以外,还有充足的装备:虽然刚开始也面临防护设备短缺,但生产很快赶了上来。当我作为入境人员到达时,无论是在机场还是酒店,从前台到保安,都在 30 多度高温下穿上了全套的防护服。

三月份时,美国一张照片让人心酸,在接收新冠病人的医院里,一线护士只套了大号垃圾袋当防护服,还不如采访他们的记者保护得好。

充足的人手:中国机场、

火车站、地铁、医院、商场门口,到处都要有人来落实政策和维持秩序。以上海机场为例,每一个人境者都会被带去划分区域的酒店隔离,一个都不可能遗漏。相比之下,美国机场虽然人流量不大,依然不可能实现这样的管理。

而在 3 月,欧洲疫情水深火热,美国尚没有颁布对欧洲的旅游禁令,这导致大量旅客从重灾区欧洲回美,挤爆各大机场,各回各家。

隔离的细节:对国外疫情的恐慌成就了各种细节的认真。我在两家酒店的 14 天隔离,几乎和本土市民零接触。我住的地方外卖、快递是不准叫的。整个酒店像穿了防护服:地板铺上了一层一次性塑料地板,墙壁、门和门把手都裹上了保鲜膜,就连房间门口放饭菜的小桌子都包上了垃圾袋。每天两次,我把手伸出门缝,有人测量体温。酒店甚至给每个人发放了投入马桶给排泄物消毒的药品。



中美疫情见闻录

□ wapi

不同的道路

在疫苗出现以前,每个政府的选择并不多。

第一种:放任自流,发展群体免疫力。这意味着接受很高比例的死亡率。当病例集中在一段时间爆发,挤兑医疗资源后,必然会牺牲体质、年龄和经济上的弱势群体。WHO 官员指责这种做法缺乏对生命的尊重。

胆大的瑞典推行群体免疫:大部分学校继续上课,消费场所继续营业。目前无法评判成功与否,至少前几个月它的经济下滑超过邻国,而有抗体的人群比例依然很低。最重要的是如此小的人口规模和密度(1000 多万人),已有 5800 多人死亡,远超北欧邻国。

第二种:承受一段时间的经济停摆,通过短时间内严格的封锁隔离,完全遏制病例增长,甚至在本土消灭病毒。等病例少到可以被充足的检测和追踪应对后,国内经济可以重新放开,只需在边境上严防死守。这是中国的选择。

在其它国家看来,这或许是乌托邦式的、不切实际的选择。这种方式确实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复制。它和可动员的人数、可调动的资源、文化习惯、公民配合度、执行力度等等都有关系。用张文宏医生的话,其它国家“道理都懂,但是他们做不到”。

美国可以选择中国的做法吗?恐怕已经不行了。由于初期应对极度迟缓,导致潜在病例数量巨大,这让检测和追踪永远不可能追上新增病例的速度。所以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去选择第二种。

它选择的是折衷的办法:抚平增长曲线,延缓传染速度,为疫苗争取时间。与之对应的是不太严格的社交距离和居家令。如果说第二种方法是短痛,那么这一种就是长痛。大家只能小心翼翼和病毒长期共存,社交、生活、工作、经济长时间处于半停滞的状态……谷歌把在家办公时间延长到了 2021 年 7 月,而脸书允许员工永远在家办公。

由于从未控制住疫情,一旦放开社交疏远政策,就会迅速蔓延。前几天看到新闻,威斯康星大学在八月底让学生回学校上学,已经有 1900 名学生感染新冠病毒。

特朗普为了开放经济,一直跃跃欲试想搞群体免疫。他趁着福奇博士做声带手术住院期间,迅速提拔了没有流行病、传染病经验的医生阿特拉斯做新顾问,提出群体免疫的主张。

福奇博士和许多专家都跳出来反对:在疫苗出来前不能这么搞,会有大量人死亡!

以前读乔治·弗雷泽写的《金

枝》。他说巫师有两类,一类是诚实的笨蛋,他们自己相信巫术是真的,咒语能生效,于是当巫术无效时,自己也不知所措。

另一类是聪明的说谎者,自己也不信巫术是真的。于是当法术失败时,他们早已准备好一套花言巧语来掩人耳目,甚至能很快找到替罪羊。

最后,是那些不信巫术的巫师们成了君主。弗雷泽说,在社会进化阶段,最高权力往往趋向于落入后者、足智多谋的权术家手中。

在疫情期间,我对他的话更深有感触。特朗普无疑是“聪明的说谎者”。

相反,比尔·盖茨最早警告全球流行病可能会爆发,提醒大家做好准备,并客观地表扬了中国的举措,指出美国存在的问题。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一直在资助美国疫苗、治疗和检测捐钱,如今他却神奇地被一些人视为引起瘟疫的源头。

美国后来的疫情,传染链并非来自中国。2月29日美国发生了首例新冠死亡,这是一个华裔女病毒学家不听官方指挥,自己私下检测发现的。几个月后,加州把早先死亡的几个疑似病例开棺检测,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例死亡是在 2 月 6 日,这说明很早就本土就有病例。

这些证据表明:最晚在一月,美国本土就有病毒在社区间传播,人们染病、死亡,只是因为没法检测、不知道而已。同时在对中国禁令颁布后,其他重灾区(譬如欧洲)不断有新的病例涌入。

目前已有 20 万美国人因新冠丧生。希望普通人在疫情中的“恐惧”、“失落”、“怨恨”,不会成为政治筹码;希望疫苗可以成功地终结国与国,人与人之间的隔离。

2020 年已经这么难了,但愿人类不再互相为难。



Despite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economic damage, Bill Gates is optimistic that a strong pipeline of therapies and vaccines will carry the US through the pandemic. PHOTOGRAPHY: JEFF BILLY
比尔·盖茨在 8 月份时批评美国检测